

三千孤儿到内蒙古以后……

□ 孙杰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连续三年发生大面积的严重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直接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活。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保育院中收养的几千孤儿的生活因食品不足陷入困境。党中央高度重视，在周恩来总理、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的亲切关怀下，远在几千里之外、生活并不宽裕、淳朴善良的内蒙古草原的额吉们（蒙古语，指母亲）敞开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嗷嗷待哺的汉族孤儿，用心、用情把他们抚育长大。在内蒙古草原上，牧民们把这些南方的孤儿亲切地称为“国家的孩子”。“三千孤儿入内蒙”，书写了我国民族关系史上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血浓于水的动人篇章。

（一）

处于自然灾害困境中的全国各地，城乡粮食和食品供应严重缺乏，一些农村家庭因为养不活孩子，无奈把幼童送往周围的城市。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的一些孤儿院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救助压力骤然加重。因为食品短缺，三千多名幼儿营养不良，面临着疾病和夭折的威胁。当时分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在南方调研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后，请求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希望内蒙古自治区支援一些奶粉，以解燃眉之急。乌兰夫回到呼和浩特后，及时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研究部署。会议认为，光支援一些奶粉，对那么多南方孤儿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只能解决眼前的困难，与其提供奶粉，还不如把这些孤儿接到内蒙古自治区，让喜欢孩子的牧民来抚养，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乌兰夫把内蒙古党委的这一决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危难关头的担当和奉献精神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许，他特别叮嘱内蒙古自治区要把这些孤儿照顾好，扶养好。于是，同样面临饥饿和灾荒威胁、生活同样困难的内蒙古自治区，敞开了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南方这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三千多孤儿，并把他们抚养长大，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大爱无疆，大爱无限。“三千孤儿入内蒙”，彰显了内蒙古各族人民为国分忧的高尚情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的生命的悉心呵护，也是我们党的执政为民理念的生动诠释。

（二）

为了使这些从南方来的孤儿在内蒙古得到更好的生活，内蒙古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拨出资金，建设了

10座大中型育婴院。1960年5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内蒙古卫生厅党组《关于1960年收容并入儿童工作的具体计划》作出批复时强调：“希望你们迅速具体把这一工作抓起来，一定要做到收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乌兰夫对接收孤儿的工作非常重视，布置自治区卫生厅、民政厅组成专门接收孤儿的机构，部署各盟市有关部门做好接收、抚养孤儿的各项工作，对这些来自南方孤儿的衣、食、住以及医疗、保育人员等问题都做了周到、细心的安排。

1960年初，内蒙古自治区开始了接收孤儿及安置工作。这些新来的孤儿并不直接送到牧民的家里，而是先在呼和浩特、包头、集宁等地的育婴院住下，检查身体、打预防针，住两三个月后，让这些南方来的孤儿完全适应内蒙古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之后，再由有抚养条件，特别是没有生育能力的蒙古族牧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抚养。为了让这些“国家的孩子”有个好的家庭，育婴院的工作人员对收养人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筛选，民政局、公安局、妇联、居委会去提出收养申请的家庭实地考察，确信收养人具有抚养孤儿的能力，同时强调优先申领的是“革命家庭”。如果后期发现有收养人没有照顾好孩子，工作人员会给孩子另寻一个符合条件的家庭收养。

三千孤儿到内蒙古以后，草原上的那些没有子女的牧民们，纷纷到育婴院领养。牧民们把孤儿接回自家的蒙古包，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料，教他们说蒙古语、学骑马、打猎，还供他们上学。从此，这些“国家的孩子”开始了他们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全新生活。有的一户领养一个，有的领养两个，镶黄旗的蒙古族卫生员张凤仙领养了六个孤儿。在困难时期，要想养活六个孩子，谈何容易。张凤仙含辛茹苦，在商品短缺、物资匮乏的艰辛岁月没有让孩子受苦遭罪。她自己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却倾力给孩子们创造学习的条件。她抚养的孩子长大后，一个考上了南京气象学院，一个考上了南开大学；两个男孩参军入伍，晋升为军官；两个留在草原，当了干部。张凤仙老人去世后，六个孩子为报答她的养育之恩，打破了蒙古族不立墓碑的习惯，给老人立了墓碑，以此来感激和缅怀草原母亲的大恩大德。

（三）

为了更好地保障这些从南方来的幼儿身心健康，内蒙古自治区的育婴院招收和训练了一批保育员，她们主要是一群18—40岁左右、具有一定文化、身体健康的青壮年蒙古族妇女和小部分汉族妇女。由于任务紧急，也有部分保育员没有读过书，但她们都在接受培训后，达到了初级卫生人员的水平。一些盟市的育婴院建立了相关的制度，还印制了《给母亲的一封信》介绍育儿方法和病儿护理知识。

在育婴院里，这些年轻的蒙古族女性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对待这些“国家的孩子”，为这些幼小的孤儿全身心地投入和付出，她们成了草原上最美丽的花朵。当年19岁的都贵玛就是其中的一位年轻保育员。都贵玛出生在一个普通牧民家庭，在她4岁时，父母双双离世，都贵玛由姨妈带大，被分配到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保育院，成了28名孩子的额吉，这批孩子中最小的不满周岁，最大的也只有5岁。面对这些从南方来的孩子，4岁便失去双亲的都贵玛对他们的处境感同身受。白天要照顾他们吃喝，晚上还要值班。夜班是最难熬的，根本没法睡觉，一个醒来哭，其他的就跟着闹。孩子生病了，都贵玛会一个人骑着马，冒着被草原饿狼围堵的危险，在凛冽的寒风中奔波几十里去请医生。在都贵玛的悉心照料下，28名来自上海的孤儿，没有一个因病致残，更无一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又经常挨饿的年代，称得上是奇迹。共和国没有忘记这位草原额吉的卓越奉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都贵玛被党中央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60年过去了，当年的这些“国家的孩子”如今都已是年过半百、儿女相伴了，并且沐浴和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阳光下。他们当中有医生、工程师、军人、教师、国家干部，也有牧民，他们大多数仍旧生活在内蒙古各地，也有一些人回到了南方，并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三千孤儿入内蒙”历史佳话的背后，是超越民族、超越地域、超越血缘的大爱，生动地诠释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血脉深情。

毛泽东在书山学海中“调查研究”

□ 徐中远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生前大力倡导，并终身躬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说的调查研究，不是深入实际，深入农村，深入工厂、学校，深入街道、社区去调查研究；而是要多读书，广读书，在史籍学海中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书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记载、纪事、纪实、评论、评说、评价等，习惯把载有与此相同内容的书都找出来，一种一种地读。前人写的，后人写的；前人的注释、评论，后人的考证、评说，等等，相关的书都找来读。在书山学海中进行调查研究，用唯物物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去研究。这是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等史籍过程中一直坚持的一种独特的读书方法，也是毛泽东一直践行到晚年的一种读书习惯。在书山学海中“调查研究”，这种读史、学史方法是毛泽东独特之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就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问题，毛泽东举出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证，加以说明。毛泽东对担任他古籍助读工作的北大中文系芦荻老师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承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

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里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摆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毛泽东认为，洋洋4000多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毛泽东这样说，是在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也就是在读全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后得出

来的一个重要结论。他说过：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除了读这些大部头的史籍之外，他还读了大量的稗官野史、各种历史通俗演义、笔记小说、札记、随笔等才形成了这样独有的看法。毛泽东在书籍、知识的海洋里调查研究很广泛、很勤奋、很下功夫，几十年里，他一直这样做。

毛泽东说过：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他认为，书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就会尊重历史、维护历史，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系毛泽东晚年图书管理员、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

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容 与

86年前的今天（1935年6月18日），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罗汉岭英勇就义。

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就位于他的就义地。纪念碑初建于1952年，又经重建和重修，总高30.59米，分为三层。碑身使用砖体结构白色水泥洗沙饰面，台座为朱红色洗沙，碑顶为琉璃瓦。碑身正面为“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八个鎏金大字，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题词。碑座正面镌刻着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撰写的碑文，全文如下：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一九二〇年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是最早向中国人民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一月回国后，负责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向导》的编辑工作。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党纲。同年参与筹办上海大学。这时和以后多年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为促成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进攻和党内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成员。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总方针。会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此后虽曾犯过短期“左”倾盲动错误，但他和战友们一道，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去恢复党的战斗力，开辟革命的新时期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随后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一九三〇年九月回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当时党的领导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遭王明等人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道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一九三四年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同年六月十八日在长汀县罗汉岭英勇就义。

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整个生命的瞿秋白烈士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
福建省人民政府 敬立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

碑文800余字，记述了瞿秋白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铭刻了他不懈奋斗、艰辛探索、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危难之际主持中央工作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的一个书香门第。青少年时代的他目睹人民浮沉于水火，萌生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

1917年瞿秋白来到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在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后，他思想更为进步，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开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他怀着“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抱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毕生的信仰，确立了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志向，于192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至1926年间，瞿秋白作为党的四大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主持宣传工作，为维护革命统一战线，与毛泽东、张太雷、恽代英、蔡和森等人协同作战形成了一股反击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强劲力量。

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量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被捕杀，大革命宣告失败。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瞿秋白临危受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开启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会后，他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参与决定和



指导各地区的武装起义，推动实现革命斗争形式转变，把中国革命推进到土地革命新阶段，为建立、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

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文艺

早在1923年，瞿秋白就翻译了《国际歌》，创造性的将法文“国际”一词改用音译“英特纳雄耐尔”，使这首歌朗朗上口在我国广泛流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首战歌。

1931年，在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迫害、无法在党的领导岗位上继续工作后，瞿秋白顾全大局，继续为革命忘我工作，大力传播革命文艺，在文化战线上打开了新的局面。

他同鲁迅一起指导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力反击形形色色的反动文艺思潮，积极探索中国革命文化发展道路，并创作和译著大量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

他在中央苏区主编的《红色中华》，大力宣传红军战绩和扩大红军运动，报道群众踊跃参军和节约粮食经费支援红军的模范事迹等，在思想舆论上有力支持和配合了反“围剿”斗争。

瞿秋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揭

露和批判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想，是中国革命文学、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为衔春色上云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留在南方为牵制敌人坚持游击战争，次年2月在行至福建长汀后被捕。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身份暴露，敌人多次对他进行劝降，最终一无所获。

1935年6月18日，在前往刑场时，他一路慷慨演说，沿途唱着《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到达刑场后，他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开枪吧！”随即，饮弹洒血，从容就义，时年36岁。毛泽东高度赞扬瞿秋白：“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瞿秋白的一生像他的诗文所希冀的那样，充分展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向往真理、追求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和为发展真理而不懈奋斗探索的可贵品格。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